

11

82-83 (1-3)

浙江省青年运动史研究参考资料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第 一 辑

共青团浙江省委青运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印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

Nov. 1989 / 0801

目 录

当“五四”浪潮冲到浙江的时候·····	夏 衍 (1)
五四时期浙江新文化运动·····	陈望道 (4)
“五四”在杭州·····	施复亮 (6)
“五四”运动和“一师”学潮·····	赵并欢 (7)
杭州“五四”六十年追记·····	钟伯庸 (11)
六十年前的钱江怒潮——“五四”运动在杭州·····	张纪昌 (13)
五四洪流中的温州·····	王建辉 (16)
宁波早期青年运动中的斗争种种·····	周闪耀、范学文整理 (20)
宁波的“五四”浪潮·····	李令红执笔 (23)
“五四”运动在绍兴·····	李 刚、孔启龙 (30)
“五四”运动的浪潮推向金华地区以后·····	吴醒耶 (34)

——浙江省立第七中学风潮的回忆

附 录

(一) 罢课宣言、答复书·····	(39)
-------------------	--------

浙江学生罢课宣言

浙江学生二次宣言

浙江第一师范全体同学第一次宣言

浙江第一师范全体同学第二次宣言

浙江第一师范全体同学第三次宣言

浙江第一师范全体同学第四次宣言

浙江学生联合会答俄国劳农政府书

杭州学生联合会答俄国劳农政府书

(二) 各界支援电文…………… (47)

诸暨学界电

海宁教育会电

江西学生会电

北京浙籍学界电

北京大学浙江同乡会电

广东学生联合会电

全国各界联合会电

留日浙江同乡会来电

北京教育界人士电文

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理事长狄侃来函

(三) 《浙江新潮》发刊词…………… (51)

简 介

独见发刊词…………… (53)

《独见》简介

当“五四”浪潮冲到浙江的时候

夏 衍

“五四”那一年我19岁，在浙江甲种工业学校念书。

“火烧赵家楼”的消息传到杭州之后，首先起来响应的是省会各中学的学生，大概在六月初，北京派来了一个学生代表，这样，杭州各校学生就在欢迎北京学生代表的名义下组织起来。六月下旬，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学联会的主要工作，除出打电报、发宣言，援助北京学生的义举之外，最激动人心的，是抵制和搜查日货。首先是各校学生分别组成了小队到贩卖日货的商店去劝告，后来就把检查到的日本货拿到西湖边上的公众运动场去烧掉。我们曾到城站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门市部去示过威，因为听说这家公司的老板简照南入了日本籍。

运动初起来的时候，提的口号是“拒签凡尔赛和约”，“惩办曹、章、陆国贼”，和“收回青岛”，“抵制日货”，按性质是以青年学生为中心的爱^国反帝运动，可是，六月初上海罢市、罢工之后，杭州的工人、店员也参加到运动的行列中来了。杭州的现代工业，大部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建立起来的，当时较大的工厂是铜元局、纬成丝织厂、武林铁工厂、火柴公司一家开设在拱宸桥的日本纱厂，而占工人人数最多的，倒是许多作坊性质的、一般人叫作“机坊”的丝织工人。工人和店员参加进来之后，运动的声势就壮大了，几次游行示威和搜查日货，就有许多工人和店员来参加了。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特别是十月革命之后，新思潮已经开始在杭州的知识

分子中间起了影响，“新旧冲突”就成了不可避免的趋势。在当时杭州各学校中，浙江第一师范是新派的代表。一师的校长经亨颐（子渊），是浙江教育界的前辈，又是浙江省教育学会的会长，他受了“五四”潮流的影响，办学采取了“与时俱进”的方针，并做了几项革新事业，例如学生自治、职员专任，国文改授国语等等，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一师有了几位“新派”教员，也就是当时被称为一师“四大金刚”的陈、夏、刘、李。陈是陈望道，夏是夏可尊，刘是刘大白，李是李次九。除出“四大金刚”之外，还有浙江“二沈”也与一师有着密切关系，二沈就是无政府主义者沈佑九和“四·一二”以后参加了清党的沈玄庐。由于一师树起了文化革命的大旗，这个学校一方面成了青年学生向往的中心，另一面也就成了旧派攻击的目标。

1919年暑假以后，“五四”初期的“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政治运动逐渐的向着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发展，中国思想界出现了进一步的“伟大分裂”。“新青年”、“解放与改造”这些杂志，不仅在青年中起了很大的启蒙作用，而且还逐渐的把分散的进步力量组织起来，形成了一支目标比较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队伍。就在这一年八、九月间，以一师为中心，杭州几个学校的少数学生通过阅读“新青年”和给这个杂志写通信的关系，开始集合起来，筹备出版一个刊物，这就是这一年十月十日创刊的“双十”。究竟有多少人参加，我已经记不清楚了，记得的是第一师范的俞秀松、周柏棣、

施存统，第一中学的查猛济、阮毅成，和甲种工业学校的汪馥泉、孙锦文和我。这个杂志是旬刊，办了两期，第二号出版之前，我们几个人在浙江省教育会的一间小房子里开了一个会，决定吸收更多的人来参加，改出周刊，并把名字改为“浙江新潮”。这时候参加进来的人有一师的傅彬然等。“四·一二”以后殉难的宣锺华同志和我们有过几次接触，他是不是也参加了这个刊物的工作，我已经记忆不明确了。

和前面说过的一样，这是一个新旧决裂和分化的时期，在当时，杭州各学校——主要是各学校的校长之间，也形成了新与旧的两个阵营，一师、一中是进步派，我念书的那个甲种工业学校则是保守派的代表。我从保守派的学校里被吸引过去，是由于同学孙锦文的介绍。他看见我经常在读“新青年”之类的杂志，就介绍我去拜访了沈玄庐和沈仲九。沈仲九送给我一本小册子——克鲁泡特金的“告青年”，这本书对我起了很大的影响。在当时，我根本分辨不出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区别，看了这本书，只觉得社会太不合理了，太黑暗了，非彻底革命不可，这样就很自然地参加到“新派”的队伍中去了。“双十”和“浙江新潮”的经费，听说是同情我们的一师的教员们捐助的，参加的人，也量力捐助一些，记得我们甲工的三个人每人出了一块钱，这对当时的穷学生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了。

到“浙江新潮”出版，这个刊物的性质已经渐渐的明白了。在“浙江新潮”的发刊词里，宣布了这个刊物“四种旨趣”：“第一种旨趣，就是谋人类——指全体人类——生活的幸福和进化，……第二种旨趣，就是改造社会，……第三种旨趣，就是促进劳动者的自觉和联合……第四种旨趣，是对于现在的学生界劳动界，加以调查批评和指导……。”从这篇发刊词可以看出，当时的一

部分青年人已经从民族、民主革命前进了一步，认识到改造社会的责任主要是要落在劳动阶级身上，而“知识阶级里面觉悟的人，应该打破知识阶级的观念，投身劳动界中，和劳动者联合一致”。在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在知识界无政府主义还有很大影响，象我们这些人，也只不过是激于爱国热情，不满旧社会的黑暗，莽莽撞撞地在寻找革命的道路，所以在当时，对于这一篇分明是受了十月革命的影响而写成的发刊词，在我们同人之间，看法上也还不是完全明确而一致的。不过，从“浙江新潮”的内容来看，这份刊物已经接受了十月革命的影响，却是很明白的，举例来说，在第一期上，我们转载了日本“赤”杂志的一幅社会新路线图，指出了新社会改造的方向，终将走向“布尔什维克”。毛泽东同志说过：“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因此，把“浙江新潮”看成是无政府主义者领导的刊物，无疑是不恰当的。

在“双十”和“浙江新潮”，我自沈宰白的笔名写过几篇文章，记得的是发表在“双十”第一期上的一篇批评杭州四家日报的文章，和登在“浙江新潮”第一期“随感录”中的两段杂感，其中一段是反对北洋政府制定的印刷物管理规则，另一段是继续对杭州四家日报的批评。在“浙江新潮”同人中，我年纪比较小，不能做别的事，所以给我分配了一项工作，——就是每次报纸印出以后，在浙江省教育会楼下的一间小屋里装信封、写地址、贴邮票。

“浙江新潮”出版到第三期，因为施存统写了一篇题目名“非孝”的文章，就在整个浙江文化教育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我和施存统不熟，但是听人说，他本人倒是一个以孝顺母亲的孝子，可是在那个时代，这

篇文章的题目，确是可以算得上“过激”的了，以这篇文章为引火点，浙江教育界、思想界的左右两派立刻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杭州各中学校长中的旧派人物，也就是当时的所谓“校长团”，就以“非孝”作为罪名，还加上了“公妻”、“共产”等等耸人听闻的罪名，勾结最反动的浙江省长齐耀珊、教育厅长夏敬观，对新派的一师校长经子渊和“四大金刚”展开了全面的攻击。其实这一场斗争已经酝酿了好久，旧派要打击和赶走经子渊，主要是因为他在一师采取了一些进步改革，深得学生拥护，其他各校学生就引据一师的先例，要求各校也作同样的改革，所以旧派抓住“非孝”这篇文章，只不过是攻击一师的借口而已。为什么发表在“浙江新潮”上的文章可以成为反对第一师范和经子渊的借口？这第一是因为施存统是第一师范的学生，再加上第二是由于我们没有经验，在“浙江新潮”的广告上写了“本社通讯处由浙江杭县贡院前第一师范转”的缘故。

在这场斗争中，还有一个插话，就在“非孝”的文章发表之后，一师的一个名叫凌独见的学生，一个人办了一张和“浙江新潮”同型的周刊，报名叫作“独见”。我不认识这个人，但是据说这个人，“眇其一目”是一个独眼龙，所以“独见”二字带有双关的意识，这是一份和“浙江新潮”针锋相对的刊物，凌独见其人号称所有文章都由他一个人执笔。而每一篇文章又都是针对着“浙江新潮”的论点而写的。事实很清楚，办这份报的决不是一个人，所谓“独见”也决不是一个人的见解，在他后面，显然还有一个有力的“校长团”的背景。

由于“非孝”，“浙江新潮”出了三期就被查禁了，这是1919年冬天的事情。

“浙江新潮”被禁止了，但是新旧斗争不仅没有平息，相反的变成了更尖锐的政治斗争。夏敬观为了“浙江新潮”通讯处的问

题几次派人到第一师范去“查办”而又找不到什么“过激党”的把柄之后，终于在第二年（1920年）二月，乘学生放寒假的时候，下令将经亨颐免职，并且指明所有原任教员，都要经过新任校长重新聘任。这意思是很明白的，主要是为了要赶走旧派的眼中钉“四大金刚”，和改组整个学校。这件事，引起了浙江教育史上有名的“一师风潮”，一师全体师生和其他各校学生联合起来，反对更换校长，反对改组学校，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后来反动派老羞成怒，终于在三月间闹出了军警包围学校，打伤学生的流血事件。“一师风潮”是1920年全国学生运动中的最突出的事件之一，全国学联和海内外爱国团体都支援了这场斗争，罢课坚持了两个多月，直到四月间才告结束。由于全国舆论的支持和学生的团结斗争，浙江的反动派没有能够彻底地打垮一师的进步力量，但是经亨颐 and 几个著名的教员还是不能不离开了浙江，陈望道和刘大白到了上海，在“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上写文章，夏可尊则被请到湖南第一师范去当教员去了。参加过“双十”和“浙江新潮”的学生，大部分都不能再在杭州住下去了，有的到了北京，有的到了上海，我在这一年毕业，想到法国去“勤工俭学”，不成，就改变主意，到了日本。以“浙江新潮”为起因的“一师风潮”是“五四”之后浙江思想界新旧交锋的第一个回合，反动派赶走了经亨颐 and 一批进步知识分子，但是革命的火种并没有熄灭，值得注意的是经过这一场斗争，不仅激发了广大学生群众的革命热情，积累了斗争经验，而且把一大批工人、店员带进了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从而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浙江的革命运动准备了条件。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他们是当时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革命运动”。因此，参加这一运动的三部分人，四十年来，随着革命的发展与深入，都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有人站在光荣的共产党员的岗位上英勇牺牲了，有人作了革命的逃兵，也有人变节堕落，变成了革命的对象。古人说：“往事如烟”，但是当我们回忆起四十年前的往事，却觉得这不是易

逝的云烟，而是一团永不熄灭的熊熊的烈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燎原的烈火中，凤凰新生了，六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们这一辈人，四十年间，能够亲眼看到旧中国的死灭和新中国的诞生和强大，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转载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
“光辉的五四”）

五四时期浙江新文化运动

陈望道

“五四”运动之前，我在日本留学。1919年6月，才回国。在杭州住了半年，1920年初就离杭到了上海，后在上海搞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因而对浙江新文化运动情况了解不多。

在我的记忆当中，浙江对“五四”运动的反应，比上海要迅速，强烈。“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从全国范围来讲，高等学校以北大最活跃，在中等学校，则要算是湖南第一师范和杭州第一师范了。

1919年下半年，我在杭州第一师范教书。当时该校校长经亨颐（同时是省教育会长）。“五四”运动，对当时每一个人的政治态度是一个考验。经先生是积极赞成和支持的，他是浙江教育界属于新倾向的老前辈，顽固派对他攻击很厉害。这学校是五年制的师范，有五个学级，每一个学级国文课都有一个国文主任教员，五个国文主任教员中有四个是倾向进步的，即夏可尊、刘大白、李次九和我，当时有人称我们为“四大金刚”。另一个是省政府派来的，原是省政府秘书，很反动。当时我们斗争的中心是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盲目崇拜。一

次我在省教育会上演讲，讲到要辨是非，反对权威，并举例说先生有不对的，学生应该批评，不批评的不是好学生等，许多老先生很有意见。学生施存统（即复亮），他写了“非孝”的文章（施在当时是一个刻苦力行的学生，思想急进。在校里，他和其他同学设有书报贩卖部，推销新书报，同时在买书中间了解同学的思想倾向），反对迷信式的、形式主义的孝（实际上他对自己的母亲还是很好的），也引起了老先生的反对。提倡白话文，他们反对的理由是不多的，只是说白话文学校里不教也可以。我们在教国文时，就挑了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给学生学习，到讲课时，我们不讲文章本身，只讲了些文艺理论。同学们反映看不懂，我们就抓住了这问题，说明即使是白话文，学校里不学习不讲也是不行的，没有一定的思想基础也是看不懂的道理，深得同志们的赞成。我们四个国文教员经常在学生中进行文章思想性、艺术性、可变性等的教育。一个月后，我们曾出了“白话文言优劣论”的题目，叫同学们做作文，当时大部分同学都是讲白话文比文言文好，当然也有少数的反对

派，其中有一个学生，在作文中以文言文的体裁大骂白话文，这是我班的学生（我是第二班，由第一班里升上来的，第一班国文主任教员是省政府派来的那个秘书）。我在修改作文时，除了文章内容和文言文的形式不加修改外，对许多文理不通的地方都做了许多记号，并写了批语：写文言文也该写通顺一些，理路不通，无从改起，重新做好再改。在教室里发本子时，他一翻全是红××，就发火了，一把抓住我的领口，叫我去见教务处。这件事情发生后，在校务会议上曾先讨论过，在夏可尊（当时学校国文课主任）等的努力下作出这样的决定：除非陈望道先生同意，不然要开除学籍。开除，我是不同意的，因不从思想上解决是不行的。后那学生哭到我的面前来，向我道歉。我对他进行许多教育，他认识到自己错误，此后这学生也倾向提倡白话文了。事后了解，才知道这学生是受那个反动教师的指使才这样做的。

提倡白话文的活动，除了我们学校外，其他学校也在我们学校的影响下开展起来了，当时杭州各报纸，也都改为白话文了。这一切对当时省政府是很伤脑筋的事。一次我们四个人在我房间里开会（我房间与那个“秘书”住的很近），那“秘书”先生在他房间里大声的与他女儿讲：“我如果没有其他办法，就用枪打死他们”的话来恐吓我们，我们对他们的可耻恫吓置之不理。四、五个月以后，教育厅长夏敬观命令校长把我们解职查办，罪名是“非孝、非孔、共产、共妻”，“非孝”是因施存统写了“非孝”的文章，“非孔”是因我们在孔子誕生日没有放假，至于其他几条，是他们加在我们头上的帽子，企图以此吓跑校长，因当时一提到“共产”，则好似“洪水猛兽”。经校长对此根本不理睬，教育厅则要撤换校长，另派一新的校长（诸暨人）来接替。这事引起了学生反对，学生关起了学校的铁门，不让校长出去，又不让

新校长进来。省政府没法，就派了警察把学生赶到操场上，用枪、刺刀把学生围起来，声言要解散学校。这时，我们四人与学生一起，学生在周围，老师坐在中间与之斗争。这事件发生后，很快的传遍了整个杭州城，杭州各学校学生都到一师来支援，要求如果解散一师，则把其他学校也解散。反动当局在这群众运动面前，没有办法，一个士绅出来调停，同我们讲条件，我们认为在警察包围的情况下根本无从谈起，不愿谈。他们没法，就只好下令警察一律后退三步。实际上这一退，警察也都散了，我们就与他谈判。谈判时，他们坚持要查办我们四个教员，我们则坚持要反动当局收回成命（即既不能查办四个教员，也不能撤换校长），以后由于这事情激起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师生的公愤，纷纷起来支援。最后，反动当局不得已收回成命而告结束，这是我们的胜利，不过同时也是我们的受挫折，从此以后，我们就很难活动了。1920年初，我就离开杭州。嗣后，杭州各报纸又改白话文为文言文，这也说明，新生事物的成长往往总是曲折的。

当时学校里的新旧斗争，除了国文课之外，还有刊物，当时办的刊物很多，一个班，几个人都出刊物，有的一个人也出刊物。

在这斗争中，我们现在检查起来是过于急进一点，有的界线也不很清楚，旧的一概否定。不过在当时情况下，不这样搞也不行，许多守旧的人物在向经校长围攻，是非不清，不急进点就不能团结同学。我们四人比较温和的是夏可尊（他是信佛教的），其次是刘大白，我那时很年轻，较急进，李次九则比我更急进。

杭州其他学校，当时比较进步的是蚕桑女校的学生和××职工学校（在旗下）教员，宗文中学则是中立的。

——载自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浙江地方党史回忆录（一）》

“五四”在杭州

施复亮

五四运动已经四十年了。

五四运动是在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之下，直接因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为而引起的。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在当时，它促使新文化运动进一步发展起来，对浙江的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也起了深刻的影响。

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我正在杭州浙江第一师范读书，我们学校里有“新生学社”的组织，有傅彬然、周伯棣等十余人参加。这个学社的宗旨是提倡新思潮，主要是提倡新文化、白话文，反对文言文，而这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内容之一，因此它在思想上替杭州的五四运动作了启蒙准备。

当北京学生掀起反帝爱国运动的消息传来，我们立即响应，在杭州成立学生联合会，向市民进行了各种抗日爱国的宣传，并且劝告他们抵制日货。我们还在第一师范学校里组织了“书报贩卖部”，每天到西湖边公众体育场去贩卖各种进步书刊。传播新思想的刊物有十几种之多，销行最广的是“新青年”杂志和“星期评论”周刊。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有学生四百人左右，有一个时期，校内就销行“新青年”一百几十份，“星期评论”三百多份。当时所谓新思潮含义很广，是指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思想而言。主要内容是反对封建旧礼教、旧道德，反对君主政治和军阀政治，提倡民主；反对旧教条、旧八股，反对迷信、盲从，提倡科

学。同时又反对旧文学和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和白话文。在新思潮的传播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则是主流，它的唯物史观和无产阶级专政等观点，在一部分进步青年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成了浙江新思潮运动的中心。

当年秋天，我们一师同学想办一个刊物，后来和原有的“双十”周刊联合，组成浙江新潮社，出版“浙江新潮”周刊。杭州第一师范学生参加的有傅彬然、周伯棣、俞秀松和我，还有浙江甲种工业学校的学生沈瑞先（夏衍）等。

“浙江新潮”创刊号的发刊辞里，提出人生最后的是生活、幸福、进化，实现条件是自由、互助和劳动，这就需要改造社会。改造社会的方法在于自由、和平。改造的主要责任应由劳动者来负担。这个刊物的主要内容，是反对封建道德，提倡从青年联合到劳动者联合。刊物出版后，还有人出了个叫“独见”的刊物，来反对“浙江新潮”。

我在“浙江新潮”第二期上，用施存统署名发表了一篇题为“非孝”的文章，引起浙江当局极大的不满。北洋军阀政府段祺瑞内阁还通令全国禁止它发行，这样引起全国人民的注意。我在写了“非孝”以后，本来打算还写一篇“我为什么做不孝的儿子”，以说明我的家庭生活和反抗孝道的原因，可是那篇文章再没有机会发表了。那时我的意思很简单，就是反对不平等的“孝道”主张平等的“爱”。对于这个问题我并没有用历

五四运动和“一师”学潮

赵并欢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简称“一师”）是一所五年制学校，分预科一年，本科四年。还有一个分部，分部为一年制。我于一九一六年秋季进入该校学习，一九二一年暑期毕业。现在，分作三点来谈谈关于在“一师”期间的情况：

一、“一师”参加革命的人比较多，而且比较早。这与“一师”学生的家庭情况比较贫穷，年龄比较大，而且在进校前都有不同的社会经历是分不开的。读“一师”的学生，一般都不敢设想进全费学校。所以来到学校以后，读书目的性比较明确，都希望自己成为为人师表的人。因此，一般的说，同学们学习勤奋，生活俭朴。这与担任校长的人也很有关系。校长经亨颐是强调“人格教育”的。他本人留学于日本高等师范，很注意教师的质量。他所聘的教师，有许多是日本留学生，他们处处为人师表。教师的来源除日

本留学生以外，还有些是当时低级师范的高材生，他们也是校内起骨干作用的。教师中有的名望很高，如：教音乐绘画的李叔同，教国文的夏丏尊，教体操的胡公冕，教文字学的徐道政和教经学的范效文等。我进校后，陆续进校的进步教师有：陈望道、俞平伯、刘大白、朱自清等。当然有一些在这时是很进步的，但后来又变了的也是有的。总之，由于当时教师和学生对教育方针都比较明确，所以教育质量很高。

学生中先后参加革命活动的很多，如宣中华、俞秀松、何今亮（即汪寿华）、徐白民、庄文恭、华林、杨贤江、郭静唐、寿松涛、王贯三、叶天瑞（即叶天砥）、张本芝、宋庆祥、唐公宪等等。杨则民也是的，他在“一师”只读了一年，就被校方劝其退学了。其原因是他在一九一七年对国文教师不满，于是国文教师就告了他。当时他们一共

史观点来分析说明，只是一种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孝”是封建道德的代表，它是巩固封建家族制度的主要支柱。而封建的家族制度又是封建专制政治的基础。“孝”这一教条，造成家长对子女的独裁统治，并且最终驱使人民做封建统治者的忠实奴才。军阀政府为维持封建势力，无怪要痛恨“非孝”而加以查禁。“浙江新潮”出了三期也就停刊了。

特别是当年夏秋间，我们第一师范曾拒绝参加“丁祭”，“丁祭”是每年春秋两季

第二个月上旬的丁日，到孔庙里祭敬孔子。我们认识到孔子及其维护封建制度的学说，应该被打倒，所以拒绝参加。为此第一师范曾招来“非礼”的罪名，顽固派把这两者联系起来，叫嚷“非礼”“非孝”，大逆不道。于是向第一师范大肆进攻。不久，校长经子渊就被迫离开学校。次年第一师范学校因更换校长发生风潮，杭州学生联合向省政府当局请愿，造成军队枪伤学生的惨案。

（转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的“五四运动回忆录”）

有三个人，学习成绩都是比较突出的。

二、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在杭州很快地过去了。如游行、宣传、抵制日货等这些运动在杭州搞得不怎么热烈，其原因是杭州的反动当局搞了阴谋，暑假提前放假，使学生分散了。但五四运动对以后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一九二四年九月，杭州有一件突出的事情，那就是学生火烧卖国贼王克敏祠堂。王克敏当时是财政部长，他的祠堂位于杭州金沙港边，祠堂前有一座桥。这一天，桥上布满了带刺刀的警察，学生上桥以后，双方对峙了很久，最后学生还是冲了过去，但烧是没有烧起来，只是将祠堂中悬挂着的“王氏宗祠”这块匾拆了下来。

五四运动以后一段时间，省议会中部分省议员提出加薪，象这样的问题过去学生是不过问的，因为这牵涉到政治，而经过五四运动的学生们也要过问这些事了。这些议员的收入本来已经很高，还要加，那怎么行？于是，议员开会时，大批学生到议会楼上去监听。当听到加薪问题时，学生们就将茶杯、痰盂等物乒乒乓乓地丢了下去。议员们躲到小房间里将门锁了起来。学生进不去，有的人就去买来了冥纸钱，烧着以后从窗户里扔进去，大声讥笑道：“你们不是想要钱吗？给你们钱吧！”就这样把他们所谓“庄严的会场”搞得一塌糊涂。后来议员们从大门出去，学生们就守住大门，经过盘问，谁反对加薪，就放走，要加薪的不让混出去。这样一来，使议员们感到事情的严重性，没有办法，他们只好请来浙军二师师长张载阳出面调解。张师长表示，加薪的事你们反对，我也是反对的，现在加薪问题议员们已经不敢再提了，希望你们要适可而止。这件事学生胜利了，充分显示了学生的力量。

因为进步的教师比较多，于是在一师内部也作出了一些改革：一是调整了教师和教材内容；二是颁发了学生自治条例。如当时

国文课选用了大量的语体文，思想内容进步的课文，这在当时比较突出。把学生的事交给学生自己办理。慎重地开了一个大会，正式宣布了这些事。以后学校开会都有学生自治会的代表参加，学生们敢想、敢说、敢写了。另外，还强调了勤工俭学。为此，学生方面的影响是：关心政治，思想活跃，出刊物，废除封建礼教。但是也有些副作用，如生活浪漫，自由进出，不讲礼貌。

三、“一师”的学潮。学潮的经过是比较曲折的。由于经校长的进步，教育厅用内部调审的名义，把他调到教育厅担任督学，以减少其对学校的影响。同时，另任教育厅视学金布为校长。调经校长故意选择了学生春节回家之际，在一九二〇年寒假期间宣布。当时还有少数学生留在校内。以徐白民为首的一些同学就聚在一起商量决定：发信给回家的同学，要他们尽快回校，共商大计。大多数同学回校后就开了几次大会，讨论怎样对待“留经”。通过了一个公约：

“留经目的不达，一致牺牲”。消息一传出就被当局知道了，官方派出了一些军警把守校门，限制学生出入。学生自治会得知后就派出童子军守护学校二门，不让军警进入。有一天，教育厅派来的校长金布带领一批人马前来接收学校。他自称是经校长的学生，对大家是忠心耿耿的，和大家是一致的。听了这些话，学生们一致抵制，把金布和他们的人马轰了出去。这样一来，矛盾就激化了。于是，学生会决定下一步的措施是到省教育厅请愿。学校大门有警察把守不好进出，但后面有一扇小门，警察是不注意的。这扇门隔着一条河，平时是不开的，只有运柴草时才开。于是，天未亮就先将桥搭好，从这里出去。请愿的学生信心很足，决心要坚持到底，准备当天晚上要在那里过夜。因当时是三、四月间，天气尚冷，大家还穿着棉衣，所以就准备了不少稻草。进入教育厅后，几

次派代表去谈判，不得要领。到了晚上，厅方挽了一个有名望的人——蔡国卿，他是当时在浙江的中国银行行长，也就是蔡颢庆即蔡元培的弟弟出来调停，对学生表示同情，并说：“这件事我负责同教育厅商量，力求满足你们的愿望，请你们还是先回去吧！”学生们因为他是北大校长蔡颢庆的弟弟，表示信任，同意暂时撤回学校。当时“一师”共有学生三百人左右，但参加请愿的人有二百多。撤回学校后，事情经蔡国卿反复调处，仍然不得解决。为此学生不满意。有一天，突然来了许多军警。警察不带武器，警官却带着手枪和指挥刀。连消防队员也来了。号称几千人，实际上只有六百人左右。他们包围了学校，妄想达到强迫赶散学生的目的。这时，学生分散在各自的自修室里。警察就四个人拖一个学生到大门口，查问学生的原籍，发给路费，用预先准备好的一大批黄包车押送上车站、码头。结果，有的硬是拖不出去；有的人到了外面又设法从半路上溜了回来，真正被押送回家的是极少数。学生自治会认为这样下去不行，会被各个击破的。于是就让所有在校同学集中到操场上，便于指挥和统一行动，力量也可以大一些。学生到操场上集中以后，警察也跟到操场上将学生团团包围，而且包围圈越缩越小，一些胆子较小的同学就往中间挤。越挤越紧，形势十分紧张。与学生在一起的部分教师见状严正指责，大声抗议。一些胆小的学生看到自己被步步逼紧而哭了起来，有的甚至要夺警官的指挥刀自杀。一面要夺，一面不让夺，把指挥刀都弄弯了。正在相持不下的时候，被阻止在校外的教师和各校的学生听到哭声，以女学生为前导冲了进来，并说：“大家要死就死在一起！”原来当警察刚一进校门，宣布人员一律不准外出，厨房也不准外出买菜时，学生自治会闻讯立即派代表从学校后面的商业学校溜出去，到各校求

援，并告诉外界人士：“一师”已断炊，警方要武力遣散“一师”。于是，各校师生闻讯赶来支援，带来的馒头等食物，从西面围墙外丢进操场。警察见各校来人支援，就进一步威胁道：“我们是要文明的，你们再这样硬下去，我们就叫‘一师’，的兵来解决。”警察所指‘一师’，就是北洋军阀杨善德的部队，以野蛮出名。领导学潮的同学对警察说：“你们是来搞遣散的，是要活人，不是要死人。现在学生被逼得要自杀，那怎么行呢？这样你们的目的是能达到吗？”警方被指责得无话可答，不得不让步。警察后退数步，让学生原地休息。原来警方打算用四个警察对付一个学生，封锁了大门，将学生一个个地从操场旁的小门押送出去，打算当天就遣散完毕。现在，事态扩大了，就不敢再贸然行动，于是情况缓和下来了。官方不得不把警察撤走，并重新抬出蔡国卿来。蔡国卿说：“这样的解决方法我也觉得不对头，但事情嘛，总是要解决的，慢慢谈！”于是，大家坐到礼堂里进行商谈，但是官方的条件学生无法接受，这种谈判也无非是拖延时间。此后，因一直停课，学生自治会就考虑组织同学们自学。尽管当局搞得很厉害，但回去的人很少，大部分人都坚持下来了。同学们都坚持了自学，情况很不错。当局为了挽回面子，就搞了个叫蒋梦麟的人来。此人当时是北大的教务长，后任北大校长，有些威信。大家对他是另眼看待的。他来解决，大家也比较高兴。蒋梦麟说：“你们学校现在正在风雨飘摇之中，僵持下去对你们不利。我同蔡校长（蔡元培）商量，征求你们的意见，介绍济南大学校长姜伯韩（即姜琦）来为你们的新校长，代替经校长。他是个能够满足你们愿望的人。如果你们相信我，我去同他商量，听我的回音，同大家商量，好不好？”学生自治会经过讨论，表示同意。蒋梦麟从南京回来后召开大会说：

“如果大家欢迎，姜先生是愿意来的，你们有什么条件，可以对我讲，我可以再去一次南京。”当时，有的同学不同意这样做，因为这样做是违反了公约的。但在大会上做记录的石樵说：“公约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留经’，目的不达，一致牺牲，着重点是‘留经’，还有一种是‘留经目的不达’，一致牺牲，意思是要达到‘留经’的目的，‘经’不一定要留。我是照后一种意思理解的，这样做没有违反公约”。他讲后没有人再发言，蒋梦麟马上说：这样好，我愿意再上南京去一趟，你们把条件商议定交给我。这里可以看出“一师”学潮中的两派，一派是坚决顶住，一派是妥协的，曲解了公约，但当时的形势大多数人不想闹下去了，所以只好这样。

姜伯韩担任“一师”校长这样的职务看来是委曲他的，而事实上是在帮他的忙。因为当时浙江有一个公费出国考察的名额，这样安排是为了帮他出国。姜伯韩为人圆滑，他来“一师”后，为了避免矛盾，对学生提出的要求还是做到的。

这次风潮虽然没有达到“留经”目的，但成绩还是主要的。学生受到了锻炼，看到了反动派外强中干的弱点，斗争信心加强了，思想有所解放，教学上也有了革新，还

建立学生自治制度。但偏向还是有的，如有的人常请假外出，学习上产生偏见等。当然，“一师”在学习上出了不少尖子的。

这次学潮，主要领导人是徐白民、宣中华。但分工有所不同。徐白民公开主持工作，如开会，讲话等。宣中华是负责到各校去联系、声援等工作。当时警察来校的主要目标是徐白民，他们一进校后就将徐白民关押起来，隔离了一个多小时才放出来。官方原以为这样遣散工作就可以顺利进行了，但事实上不这样简单，学生自治会早已有所准备。石樵也是学生自治会成员，但他主要是做笔头工作的，如开大会做记录，对外发文时执笔。当时在校内威信最高的是宣中华和徐白民，由于他们两人工作突出，别人也插不上手了。这次风潮，上半年就解决了。放暑假时宣中华、徐白民等都毕业了。毕业后他俩都被聘为“一师”附小教师。宣中华在这里任教半年，就离开了。一九二一年暑假，我从一师毕业后被聘为附小三部教师，和徐白民共事半年。

（摘自《浙江党史资料通讯》

一九八二年第一期。全文有二个部分，此系第一部分。题目是编者另加）。

杭州“五四”六十年追记

钟伯庸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从北京展开以后，天津南开大学等校的学生首起响应。接着北京学生联合会推派学生代表分赴全国各地，传达北京“五四”运动的进展情况，从北京、天津经上海到达杭州。来杭的代表有罗家伦、方豪、段锡朋等人（罗、方两人是北大代表）。段锡朋往浙东传达，罗家伦和方豪分别在浙江省教育会会场和省立第一师范礼堂，向杭州各界人士及学生作传达报告。传达时，讲得慷慨激昂，他们声泪俱下地控诉卖国政府头子段祺瑞和陆宗舆、曹汝霖、章宗祥三个大汉奸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秘密勾结的各种卖国罪行。又说，北京的学生群众虽已将这三个大汉奸给予惩罚，但仅处治三个大汉奸而不打倒卖国政府，不取消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中国人民将变成日本帝国主义的奴隶，“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中国人民的奇耻大辱和无穷祸害仍不能湔雪消灭。代表们最后指出：为了把运动迅速进展下去，必须要唤起各界人民一致起来实行罢课、罢工、罢市，召开群众大会，举行示威游行，同时要坚决抵制日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杭州的学生群众听了报告后，无不义愤填膺，即由省立第一师范学生号召各校成立学生会，推出代表，组织杭州学生联合会，并决定在最短时期内在省公众运动场，举行民众大会。接着杭州学联很快就宣告成立，并仿照北京学联，设评议会及理事会。评议会是议事机构，理事会是执行

机构，各校参加学联合的代表选出连瑞琪为评议长，宣钟华为理事长（连瑞琪是浙江医学专校的学生代表，宣钟华是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代表）。杭州学生联合会为了贯彻反对日帝经济侵略的精神和执行抵制日货的有效措施，设立了国货维持会，推选评议员徐麟书为会长（省立一师学生）。国货维持会对抵制日货的工作，做得颇有声色，各法团大多参加日货检查队，各校学生为检查队员，经常到销售日货的商店内检查日货。经过一定的审查手续，认为确系日货时，就在省立公众运动场集中焚毁，后来经过研究讨论，认为集中焚毁，不如拍卖归公，既可不经售日货，也可将拍卖所得补充公用开支。如有大宗拍卖收入，交存银行，由各法团公议处理。杭州人民对此办法亦颇同意。所以国货维持会对抵制日货这项工作进行得尚有成效。杭州学联曾出版每周一期的会刊，由省立一师、省立女师、省立一中等校派学生编辑发行。会刊上曾发表一首雪耻歌，作为学联会歌。歌词是：

“二十一条亡国密约，至今不能取消。
山东亡矣，青岛亡矣，可怜国本飘摇。
风景不殊，山河易色，吁嗟禾黍苗苗。
懿欤同胞，懿欤同胞，雪耻端在今朝”。

这首曲调低沉、充满着悲凉情绪的歌词，是依据当时爱国雪耻运动是以取消中日二十一条密约为基础而作的，（歌词的作者

是第一师范学生)。

随着“五四”运动蓬勃兴起的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杭州省立一师学生对“五四”运动的巨大浪潮和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兴起都迎头响应,并把“五四”精神贯彻到新文化运动中去。从1919年下半年起,第一师范发生空前急剧变化。当“五四”运动普及到全国之际,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陈独秀、钱玄同、沈尹默等,开始把西洋各种新学说介绍到中国,他版出们的《响导》、《新潮》、《新青年》等刊物,传播新思想,新学说,他们叫出“我们要德谟克拉西(即民主主义 democracy 的译言)”、“我们要赛因思(是科学 Science 的译音)”等口号,全国青年急起响应,要对中国的旧文化(包括一切文化领域中的旧道德、旧风俗、旧习惯、旧思想)进行革新运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即组织新书刊贩卖部,将北京、上海出版的新报刊卖给各校学生,这给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方向,开辟广阔的道路。一师学生施存统在《浙江新潮》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非孝”的文章。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经亨颐,是一位极其开明刚毅而具有新思想的先进人物,他所聘请的教师中有陈望道(是中国第一个将《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者)、刘大白、夏可尊、李次九等。“五四”运动时,一师首先成立学生自治会,倡议学校经济公开,学生可以自己管理自己,同时废除读经课(指四书五经),提倡白话文,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又拒绝参加“丁祭”(旧例每年春秋两季要由校长率领学生去孔子庙祭祀。被派定参加祭孔典礼的学校是省立第一师范和私立宗文中学)。凡此种种,都触犯了当时社会的嫉忌,一师校长经亨颐被咒

骂为“离经叛道”和“洪水猛兽”。又在1917年时,浙江省议会议员在议会内自己提案集体要求增加薪金。事为第一师范学生所悉,即联合其他学校学生向议会严加责问,议员们则掩耳盗铃,置群众意见于不顾,于是激起杭州临时组成的公团包围,进行责难,议员们才把加薪提案收回撤销,但议会因此迁怒于省立第一师范,诬说公团的正义行动是校长经亨颐指使的,扬言要对经亨颐加以报复。1919年冬,浙江省省长齐耀珊和教育厅长夏敬观以及省议会的议员们沆瀣一气,联合计划进行解散第一师范,驱逐校长经亨颐的阴谋活动。1920年2月,由教育厅厅长夏敬观秉承省长齐耀珊的意旨,命令调任经亨颐为浙江省视学。这激起了第一师范全体学生的愤怒,很快掀起了挽留经校长的风潮,他们组织了护校、挽经大会,发表宣言,与反动当局派驻学校的军警抗拒斗争,并响应学联会掀起反齐、反夏斗争的高潮。最后得到各校学生的援助,和省内外各界人士的函电支持,得到了斗争的胜利。

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相距八年,从“五四”运动到1925年的“五卅”惨案又相距六年,在漫长的岁月里,青年学生都站在革命运动的前列,涌现出许多英雄事迹,不少青年壮烈牺牲。记得鲁迅先生在哀悼杨杏佛烈士的诗中说:“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不禁要同声一哭!

一九七九年

(编者注:作者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肄业省立第一师范,当时名叫钟英如)

六十年前的钱江怒潮

——五四运动在杭州

张纪昌

在伟大的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记者访问了一些当年在杭州参加过五四运动的老人。从他们的回忆中，使我们看到了：老一辈革命家和五四运动的前驱者们，在当年是怎样以天下为己任，充分发扬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作斗争的。这些艰苦的斗争说明了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得来是多么的不容易啊！下面记述的，是老人们回忆当时在杭州参加斗争的几个片断。

北京来的消息

一九一九年五月上旬，一天下午，夕阳映照着二龙头山，之江大学（现浙大三分部校址）的校舍和四周的树木，都象抹上了一层胭脂似的。这时，校工从邮局取报纸和信件回来了，一位专管报刊的自助生接过报纸一看，一条醒目的消息跳到眼前：“京中各校学生，因山东问题失败，昨晚集众游行街市……”

这年年初，巴黎和会开会，列强拒绝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原来侵占的青岛和山东归还我国的要求，反而强迫我国承认屈辱的二十一条，并追认日本继承德国对我国山东领土和主权的侵略。当时我国的北

洋军阀政府准备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之江大学的这位自助生看了这条消息，立即异常激愤地高叫起来：“大家来看呀，我国在巴黎和会上失败啦！北京的学生已经起来了：火烧赵家楼，打倒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

同学们从四面八方奔来，抢着要看报纸。人们沸腾了，震怒了，报纸读不下去了。

晚上，同学们聚集在总课堂里，议论开了：

“列强太欺负我们了！”

“这批卖国贼该杀！”

“我们也要行动起来。”

于是，商量决定：组织一个委员会，通电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派出代表与杭州各中等以上学校联络，筹组杭州学生联合会。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杭州一些学校的学生代表，在六和塔顶层秘密开会，决定成立杭州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救国会，并确定了任务，配合全国运动，杭州的学生爱国运动也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空前的大集会

清晨，弥漫在湖滨公众运动场（现一公园）上的雾气还未消散。全城十多所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已经从四面八方朝这里涌来。他们手持写有各种标语的小旗，有的还画了

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丑像拿来示众。这是五月中旬的一天，三千多学生在这里举行“学生联合救国会”成立大会。

人们一个个登上体操指挥台，慷慨激昂地发言，揭发、声讨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和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一位老大爷用手杖猛击着讲台，涕泪交流地控诉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浙江第一师范的袁心聚老师，也上台发言，愤怒地揭露了日本侵略军烧死我国同胞的暴行。听到这里，全场同学极度激愤。

“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还我青岛！还我山东！”

一阵阵口号声如钱江怒涛，响彻西湖上空。

大会通过了向省议会请愿书后，开始游行。当队伍行经督军署（现市革委会所在地）和省长公署（现省轻工业局所在地）时，学生们振臂高呼：“还我青岛！还我山东！”到了省议会（现省公安局所在地），推出代表宣读请愿书，要求致电巴黎和会交涉，归还青岛和山东主权；致电北洋政府，要求惩办卖国贼曹、章、陆等人。每读到激动处，宣读者声泪俱下，群众失声痛哭。游行直至傍晚才结束。这是杭州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帝反封建集会游行。

光荣的第一师范

随着五四运动的发展，杭州新旧势力的斗争更加激烈。一九二〇年春天的“一师风潮”，就是这一斗争的集中表现。

浙江第一师范（杭一中前身），是当时杭州各学校中新派人物萃集的地方。校长经亨颐在五四运动影响下，推行革新措施，学生思想活跃，使一师成了杭州学生运动的中心。浙江军阀政府把一师和经亨颐视为“眼中钉”，必欲去之而后快。他们抓住该校二年级学生施存统在《浙江新潮》上发表《非孝》文章的事，于一九二〇年二月，下令撤

换经亨颐一师校长的职务，宣布改组一师。

一师学生在全市各校学生支持下，与反动当局展开了顽强的斗争。他们先后四次向社会发表宣言，并到省教育厅、省长公署请愿，要求让经亨颐复职，拒绝新校长到任。他们的斗争，得到了全国各界人士和海外侨胞的声援。反动当局却老羞成怒，悍然于三月二十九日早晨，派出七百多名军警，包围了只有三百多个学生的一师，企图把学生武装押回原籍，解散一师。学生们毫不畏惧，在大操场上集合，低年级的同学在中间，高年级的同学在外围保护。面对反动军警的枪口，同学们依旧齐声歌唱、高呼口号、发表演说，抗议军阀政府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罪行。

这时，许多散居校外的一师进步教师，赶着多方设法援救学生。女师同学闻讯后，立即停课，一面联络各校学生去支援，一面自己出钱，买了糕饼、水果等，去慰问一师同学，各校几千学生先后赶到，冲垮了军警的拦阻，与一师同学共同斗争。

就在学生与军警对峙的时刻，反动当局打来电话，要学生派代表去省长公署“谈判”。学生会领导人宣钟华（又名中华）等由军警“陪同”去省长公署。到了那里，省长齐耀珊传出话来，要代表转告同学，迅速返回原籍，并声言要改组学校，宣钟华等坚决拒绝。双方僵持着。及至各界人士出面调停，齐耀珊见各校学生都发动起来了，才被迫答应：学校制度维持原有精神，新校长人选经同学们同意后再派。当宣钟华等回校向大家报告斗争经过后，七百军警就夹着尾巴灰溜溜地走了。

同学们唱呀、跳呀，在一师大操场上，欢呼斗争的胜利。

齐耀珊滚蛋

杭州广大学生通过五四以来的斗争，逐步认识到反动统治当局是爱国运动的最大障